

doi: 10.3969/j.issn.1007-6522.2012.04.005

# 加拿大英语文学在中国的译介(1949—2009)

## ——兼论社会文化对文学翻译的制约

朱振武<sup>1</sup>, 綦亮<sup>2</sup>

(1. 上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444; 2. 华东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241)

**摘要:** 作为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拿大英语文学的译介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沉潜期、20世纪80年代的起步期、90年代的发展期和新世纪的繁荣期四个阶段。这一译介历程体现了社会文化对文学翻译的制约。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心理、社会文学范式、读者的审美习惯等超文本因素会对文学翻译提出不同的要求, 从而形成形态、功能各异的翻译文学。

**关键词:** 加拿大英语文学; 文学翻译; 翻译文学

**中图分类号:** I04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6522(2012)04-0039-12

加拿大英语文学无论在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方面, 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涌现出了如斯蒂芬·里柯克(Stephen Leacock, 1869—1944)、弗雷德里克·格罗夫(Frederick Grove, 1879—1948)、莫利·卡拉汉(Morley Callaghan, 1903—1990)、休·麦克伦南(Hugh MacLennan, 1907—1990)、罗伯逊·戴维斯(Robertson Davies, 1913—1995)、玛格丽特·劳伦斯(Margaret Lawrence, 1926—1987)、艾丽斯·芒罗(Alice Munro, 1931—)、玛格丽特·阿伍德(Margaret Atwood, 1939—)和迈克尔·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 1943—)等一大批优秀作家和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 1912—1991)、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 1947—)这样的世界级批评家。随着整体实力的不断壮大, 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正逐渐成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加拿大英语文学的译介又是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为关键的是, 加拿大英语文学在我国的译介历程深刻体现了社会文化对文学翻译的制约, 为深入理解文学翻译的跨文化属性提供了重要参照。因此, 为了更好地回顾与展望我国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研究, 洞悉文学翻译的发生机制, 本文将对建国以来加拿大英语文学的译介做一番梳理和述评。

收稿日期: 2010-04-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09ZD071)

作者简介: 朱振武(1963—), 男, 山东兖州人。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 三峡大学特聘教授, 上海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

### 一、跨文化语境中的译事发生

加拿大英语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始于20世纪30年代。我国翻译的首部加拿大英语文学作品是拉尔夫·康纳的长篇小说《天上舵工》(广学会,1936)。建国后,1954年,平明出版社出版泰德·阿兰和塞德奈·戈登合著的长篇传记小说《白求恩大夫的故事》。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约瑟夫·华莱斯的诗歌选集《我的兄弟们》;两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华莱斯诗选》。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戴森·卡特的长篇小说《明天是我们的》;1962年,他的另外一部长篇小说《没有父亲的儿子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57年至1961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欧·汤·西顿的动物故事选集6种。《译文》<sup>①</sup>杂志(《世界文学》的前身)于1957年6月号刊登了萧乾翻译的里柯克幽默小品;1963年,同样出自萧乾(署名佟荔)之手的《里柯克小品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不难看出,建国后到“文革”前,加拿大英语文学在我国的译介可以说不成规模,也不成体系,数量上也少得可怜。“文革”期间,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几乎陷入停滞,“从1966到1971年,长达五年时间中国没有出版过一部外国文学译作”;<sup>[1]</sup>1972年之后情况有所好转,但从总体上看,外国文学翻译依然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本来就如蜻蜓点水般的加拿大英语文学译介在此期间更是销声匿迹。总之,改革开放前,我国对加拿大英语文学的

译介相当匮乏。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无论是广义上的翻译,还是狭义上的翻译,无不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进行。”<sup>[2]</sup>作为翻译的一种,文学翻译同样是“跨文化的符际语言行为”,与包括源语文化系统、译入语文化系统在内的不同文化系统的相互作用。<sup>[3]</sup><sup>[11]</sup>因此,从一个方面看,文学翻译是社会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受社会文化制约。将文学翻译视为多元文化系统互动中的一个环节,可以宏观地掌握文学翻译的发生机制,揭示文学翻译背后的深层社会文化动机。照此思路解读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加拿大英语文学的译介情况,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译入语意识形态制约文学翻译的主题选择。在译入语的整体文化系统中,意识形态和文学翻译同属子系统。“意识形态是社会文化系统中通过各种表征符号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思想、意识和观念的总和……对文学、文学翻译、宗教艺术等子系统产生着隐性的、深刻的影响。”<sup>[3]</sup><sup>[12]</sup>虽然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翻译事业有了长足发展,但在选材上主要侧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比如苏联、东欧诸国的文学作品。英美国家的文学作品偶有涉猎,也主要是意识形态性较强,即符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比如狄更斯、哈代、马克·吐温、杰克·伦敦和德莱赛等人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sup>②</sup>再看被译

①指1953年7月在北京创刊的《译文》,不是1934年9月在鲁迅倡议下创刊于上海的《译文》。之所以沿用之前的刊名是为了纪念鲁迅先生。参见查明建、谢天振《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59-560页。

②建国后10年,有3526种苏联文艺作品(主要是文学)被译成汉语,而英美两国文学译作的总和才只有452种。参见王建开《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1919—194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介过来的加拿大作家。华莱斯和卡特同属加拿大进步作家,自然被接纳;西顿是动物小说家,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因此无伤大雅。至于里柯克,由于和马克·吐温的创作风格相近,所以他的译入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后者的受欢迎度。建国后到“文革”前的17年间,“欧美作家的作品在我国的介绍除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巴尔扎克较多外,就算美国的马克·吐温了。仅十几年的时间,他的重要作品几乎全部被翻译出版了”。<sup>[4]</sup>当源语与译入语文化系统存在意识形态冲突时,在译介时大致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对源语文学作品的完全否定,也就是不引入、不译介;二是作为反面教材、批判的对象引入;三是译者采取必要的翻译策略对源语文本加以归化。就翻译策略而言,除了常规的技术性归化译法外,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译者还会在“前言”或“译后记”中强调所译文本的意识形态正确性,从而保证翻译的合法性。所以,我们会在《里柯克小品选》的“译后记”中读到“他(指里柯克)同情小人物,憎恶大富甲;他善于挥动一支笑骂的笔,揭露资本主义社会里种种不公道、不合理的现象,用简洁有力的笔触刻画那个社会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剖析他们灵魂中的贪婪自私、庸俗浅薄。”<sup>[5]</sup>“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指导原则往往将艺术性见长的文学作品过滤掉,因而极大地限制了文学翻译的主题选择面,说明“文学无法回避政治、时代的影响,在对中国翻译文学史的书写过程中,政治永远是让人无法忽略的因素”。<sup>[6]</sup>

其次,源语文化中的文学资源的成熟度影响源语文学在译入语中的接受。“译者在目标语文化的操控下选择文学作品的主题和来源时,一般会先把目光投向那些文学资源比较丰富、主题选择范围较广的外国文学。

换言之,当一种文学建立了庞大的文学体系,并且发展到一定的成熟度,能为文学输入国提供较为广泛的主题选择余地,才可能在最大范围内被广泛译介。”<sup>[3]</sup><sup>[80]</sup>英国、法国等传统欧洲文学强国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秀的文学传统,文学成就早已为世人认可;美国文学的历史虽不及英法等国,但名家辈出,成就灿然,影响力显然已经超过前者。所以,尽管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英美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受诸多外部因素的负面影响,但仍然保持了一定的规模。作为英、法的殖民地,加拿大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摆脱宗主国文学的影响。18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以“联邦诗人”为代表的加拿大英语文学开始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二战结束前,加拿大英语文学已初具规模,里柯克、卡拉汉、格罗夫和麦克伦南都创作出了自己的最佳作品。但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的加拿大英语文学还是优秀作家的单兵作战,还没有形成合力和集团优势。二战后,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国力的增强,加拿大英语文学开始为世界瞩目,但“真正具有本国特色及文化独立意识的加拿大文学,是始于60年代末的当代文学”。<sup>[7]</sup>然而即便如此,加拿大英语文学在当时也没有出现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级文学巨匠。在C·F·克林克主编的1965年版《加拿大文学史》的“结束语”中,弗莱曾不无遗憾地承认:“世界上的大文豪能使读者在其作品中成长,丝毫不感到这文学天地的局限性,加拿大却举不出一位作家可以让我们作出这样的评语。”<sup>[8]</sup>即使在阿特伍德创作《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一书的20世纪70年代,大部分加拿大读者对加拿大文学的了解也仅限于里柯克,甚至连作家圈内人士也不看好加拿大文学的发展前景。<sup>[9]</sup>源语文学资源的相对匮乏和成熟度的欠缺限制了译入语受众

对源语文学的认识,就连萧乾先生这样的翻译大家多年后都承认:“我对加拿大文学毫无了解,只是40年代在伦敦时,曾买过几本企鹅版(当时一本只需六个便士!)的里柯克小品。”<sup>[10]</sup>因此,出现加拿大英语文学译介匮乏的局面也就成为必然。

## 二、社会转型期的译介体系化

改革开放后,我国迎来了20世纪外国文学译介的第二次高潮,加拿大英语文学译介也因此出现了新气象。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的社会文化转型期,社会意识形态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出现了新的社会文化格局。“特定的社会文化格局会形成特定的文化需求、文化地位和接受语境,这些因素会以潜在的方式作用于赞助人与译者,使赞助人与译者在顺应特定社会的文化需求、文化地位和接受语境的过程中完成对文学翻译的主题选择。”<sup>[3]51</sup>以多元化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文化格局影响了受众的文化心理和对文学本质的认识,进而促进了文类和题材选择的多元化。另一方面,加拿大英语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也为译入语国提供了更加丰富和多元的译介资源。阿特伍德、芒罗等成名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作家继续推出佳作,声誉日隆;约翰·斯特弗勒(John Steffler)、安妮·米切尔(Anne Michael)等文坛新秀异军突起,锋芒毕露。另外,在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带动下,包括加拿大华裔英语文学在内的少数族裔文学也正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在文类方面,20世纪80年代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涉及长篇小说、中篇

小说、短篇小说、<sup>①</sup>诗歌、散文和戏剧。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成为我国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在这种背景下,被誉为“职场小说之王”的加拿大畅销书作家阿瑟·黑利自然广受欢迎,作品被大量译介。黑利的小说几乎都以美国为背景,通过讲述行业内部的故事,深入剖析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被称为“行业入门百科全书”。70年代末、80年代初,黑利的主要作品都有了中文版,比如《钱商》(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汽车城》(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最后诊断》(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大饭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等等。《译林》于1982年第4期译介了黑利的中篇小说《08跑道》(与约翰·卡斯尔合著),于1986年第4期选译了长篇小说《烈药》。上海文艺出版社甚至还出版了黑利的妻子创作的传记《我嫁给了畅销书作家》(1985),作家本人及作品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题材与黑利小说相似的保罗·厄尔德曼的金融小说也得以译入,比如《世界金融风云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投机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和《美元风暴》(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文革”前就得到译介的西顿和里柯克在80年代并没有淡出读者视线。少年儿童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西顿的《贫民窟里的猫》;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里柯克代表作、长篇小说《小镇艳阳录》。此外,休·加纳的《坎坷路》(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麦克伦南的《长夜漫漫》(重庆出版社,1987)和露西·蒙哥马利的《绿山墙的安妮》(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也得到译介。

<sup>①</sup>就加拿大英语短篇小说的译介来说,《译林》杂志是一个重要平台。1979至2009年,《译林》共刊登了19篇优秀的加拿大英语短篇小说,既有卡拉汉和格罗夫这样的经典作家,也有梅丽莎·哈迪(Melissa Hardy)这样的新生代作家。为了行文方便,涉及《译林》译介的短篇小说,本文就不一一说明了,特此说明。

加拿大文学有优秀的短篇小说创作传统,加之短篇小说的可读性强,所以短篇小说的译介是这一阶段加拿大英语文学译介的主要内容。卡拉汉的短篇小说具有较高的译介率,《外国文学》1981年第10期、《当代外国文学》1982年第1期、《外国文学》1987年第2期。《世界文学》1983年第6期推出“加拿大作品辑”,译介了查·乔·道·罗伯特茨、劳伦斯、休·胡德、玛·加兰和阿特伍德的短篇小说。《外国文学》1987年第2期也刊登了劳伦斯的作品。其他得到译介的作家还包括加纳(《世界文学》1980年第5期)、辛克莱·罗斯(《外国文学》1981年第10期)、罗伯特·克罗耶奇(《外国文学》1981年第10期)。短篇小说除了通过期刊得到译介外,还见诸各种短篇小说集,比如《加拿大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加拿大短篇小说选》(重庆出版社,1985)和《结婚礼物:当代加拿大短篇小说选》(花城出版社,1986)等。

诗歌方面,《当代外国文学》1982年第4期译介了肯·迈克尔的作品,《世界文学》1983年第6期译介了艾·波·约翰逊、埃·约·普拉特和阿特伍德的诗歌,《外国文学》1984年第12期译介了厄利尔·伯尼、欧文·莱顿和翁达杰等人的诗作。散文方面,重庆出版社1984年出版《里柯克幽默随笔集》,《世界文学》1988年第2期推出“加拿大文学专辑”,译介了卡拉汉、麦克伦南和劳伦斯的散文。戏剧方面,《外国文学》1981年第10期和《世界文学》1988年第2期分别译介了乔治·里加和迈克尔的剧本。

改革开放初期,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仍然是外国文学译介的重要选材依据,所以,这个时期的加拿大英语文学译介题材还是以现实主义作品为主,但所选作家大都是文学成

就已经得到认可的经典作家,作品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和美学价值。因此,总体上讲,社会性与文学性兼顾是这个阶段加拿大英语文学译介的选材标准。另外,少数族裔作家——比如犹太裔作家莱顿和南亚裔作家翁达杰——得到关注,从一个侧面说明译介选材多元化发展趋势。

加拿大英语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资料也在这一时期得到译介。《外国文学》于1981年第10期选译了弗莱为1965年版《加拿大文学史》撰写的“结束语”,虽不是长篇大论,但该文深入分析了加拿大作家的创作心理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曾经两次被收入弗莱文集,是一篇研究加拿大英语文学和弗莱批评思想的重要文献。考虑到我国“对西方文论的译介在80年代中期以后形成高潮”,<sup>[1]</sup>《外国文学》的这次译介可以说非常具有前瞻性,也增加了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译介的广度和深度。《世界文学》于1983年第6期刊登了加拿大批评家、文学月刊《加拿大论坛》主编山姆·索莱基的特稿“加拿大英语文学介绍”。该文全面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加拿大英语文学,语言精练,见解独到,是一份珍贵的研究资料。此后,《世界文学》又于1988年第2期译介了弗莱的两篇文论,并在“现代作家小传”中简要介绍了这位加拿大文学和文化批评巨擘。

我国学者撰写的关于加拿大英语文学的综论性文章,也是这一时期加拿大英语文学译介的一部分。《外国文学》于1981年第10期刊登了黄仲文的《加拿大的英语文学》。文章从宏观上介绍了加拿大英语文学的背景、发展脉络和代表作家,是国内较早介绍加拿大英语文学的论文。之后黄仲文和张锡麟合作,在《当代外国文学》1987年第4期和1988年第3期发表《加拿大英语文学的特征

和发展》和《加拿大英语文学背景初探》两篇文章,进一步梳理了加拿大英语文学的背景、特征和发展阶段。综论性文章虽不深入,却能比较全面地介绍源语国的译介资源,具有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

如果说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外国文学译介与外国文学自身的发展存在错位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外国文学译介正逐渐填补这种错位造成的空白。加拿大英语文学的译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80年代的加拿大英语文学译介大致确立了我国此后加拿大英语文学译介的走向和框架,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特点:

第一,文学作品翻译、文学理论翻译与综论性文章相互作用,共同构筑加拿大英语文学的译介体系。

第二,文学期刊在推广外国文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许多优秀的加拿大英语文学作品最先通过文学期刊得到译介。

第三,翻译出版开始走上丛书化、系列化道路。1984年,四川外国语学院加拿大研究所推出“枫叶丛书”(即上文提到的《里柯克幽默随笔集》、《加拿大短篇小说选》(重庆出版社,1985)和《长夜漫漫》),首次尝试集中成套地译介加拿大文学作品,<sup>[12]19</sup>为此后的加拿大文学翻译出版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 三、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译介成熟化

进入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量明显增加。长篇小说方面,得到译介的作家作品包括:黑利的《晚间新闻》(译林出版社,1990)、阿特伍德的《假象》(又译《浮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和《可食

的女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威廉·贝尔的《幽灵出没的日子》(明天出版社,1994)、迈克尔·布洛克的《黑娃的故事》(译林出版社,1996)、苏珊娜·穆迪的《丛林中的艰苦岁月》(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翁达杰的《英国病人》(作家出版社,1997)、盖伊·范德海格的《英国人的仆童》(重庆出版社,1998)、埃里克·科克的《两个“半犹太人”的命运》(重庆出版社,1998)、安妮·迈克尔斯的《漂泊手记》(译林出版社,1998)、劳伦斯的《石头天使》(译林出版社,1999)、卡罗尔·希尔兹的《斯通家史札记》(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和《拉里的家宴》(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阿特伍德的《别名格雷丝》(译林出版社,1998)、《可以吃的女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和《浮现》(译林出版社,1999)。《当代外国文学》1998年第4期选译了阿特伍德的长篇小说《使女的故事》。

短篇小说方面,《世界文学》1990年第5期推出“莫利·卡拉汉专辑”,译介了卡拉汉的11篇短篇小说;1994年第5期译介了罗欣顿·米斯垂、丹·戴·摩西、希曼妮·班奈尔吉和狄昂妮·布兰德的作品;1998年第6期译介了芒罗和希尔兹的作品。《外国文艺》1992年第4期译介了劳伦斯的作品。<sup>①</sup>《外国文学》1993年第4期推出“加拿大著名女作家阿特伍德作品译介专辑”,刊登了她的短篇小说;1994年第6期译介了黑人作家劳伦斯·希尔和西塞尔·福斯特的作品。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包括《欲对你说:加拿大短篇小说精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冰河之滨:加拿大短篇小说精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加拿大女作家短篇小

①《外国文艺》还于1992年第6期推出“加拿大当代英语文学专辑”,从小说、诗歌、散文、文论四个方面介绍了加拿大英语文学。

说选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加拿大短篇小说选读》(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里柯克短篇小说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多萝西·斯比克的短篇小说集《爱之猎物》(重庆出版社,1998年)。

诗歌方面,阿特伍德的诗作是译介的重点。《当代外国文学》1991年第4期、《译林》1994年第4期、《世界文学》1998年第6期)。另外,《世界文学》1994年第5期译介了阿尔·珀迪、帕·莱恩和劳娜·克劳吉尔等人的作品;1998年第6期译介了帕·凯·佩奇的诗作。《外国文学》1994年第6期译介了著名黑人作家西里尔·达贝廷的作品。出版的主要诗歌选集包括《比眼泪更美:加拿大现代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加拿大抒情诗选》(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加拿大联邦诗人诗选》(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

散文方面,主要出版作品有《里柯克幽默小品选》(作家出版社,1990)、《里柯克随笔集》(海天出版社,1993)和《李柯克幽默作品选》(漓江出版社,1998)。《外国文学动态》1994年第5期译介了罗伯逊·戴维斯的散文。《世界文学》1994年第5期刊登了阿特伍德和苏珊·马斯格雷夫的作品。

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90年代加拿大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题材更加多元,既有《可以吃的女人》这样关注现代女性生存状况的女性主义作品,也有《漂泊手记》这样记录二战后犹太人寻找精神家园的诗化小说,还有《英国病人》这样兼具后现代与后殖民色彩的作品。此外,米斯垂、班奈尔吉、布兰德和达贝廷等少数族裔作家的作品得到译介,进一步说明选材的多样性,同时体现了当代加拿大英语文学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儿童文学和动物文学仍然是译介对象。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推出《绿山墙的安妮》的复译版。北岳文艺出版

社1998年出版法利·莫厄特的《与狼共度》。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当代著名女侦探小说家盖尔·鲍恩的《画廊血案》和《死亡竞选》(漓江出版社,1997)、侦探小说家劳伦斯·高夫的《杀手》、《迷幻情人》、《记忆巷道》、《人性之外》、《厄运》(群众出版社,1998),以及著名科幻小说家威廉·吉布森的名作《神经浪游者》(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也于20世纪末与中国读者见面,进一步丰富了加拿大英语文学的译介题材。

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资料的译介方面,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推出“加拿大文学丛书(第一辑)”,出版了阿特伍德的《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和收录了弗莱等批评家论文的《就在这里:加拿大文学论文集》。《国外文学》1992年第2期刊登了袁宪军编译的《当代加拿大英语文学批评综述》,该文较为完整地梳理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主流的加拿大英语文学批评模式,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外国文艺》1992年第6期译介了克罗耶奇和哈琴的论文。克罗耶奇和哈琴都致力于后现代主义研究,是享誉世界的文学批评家,而哈琴更是继弗莱之后加拿大最有成就的批评家之一。《世界文学》1994年第5期译介了哈琴的评论文章《另外的孤独》,在该文中,哈琴以文学为参照,深入分析了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的复杂性和缺失,是一份研究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的重要文献。同年,哈琴的代表作之一《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加拿大现代英语小说研究》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该书全面阐述了加拿大英语小说的后现代特征,是研究加拿大英语文学的必读书目。90年代,中国举办了两届弗莱国际研讨会,“不仅巩固了弗莱研究在中国的坚实基础,而且将弗莱研究引向纵深发展”。<sup>[12]20</sup>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弗莱的多部重要

著作(包括论文)都在这个时期得到译介,比如《诺思洛普·弗莱文论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批评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和《批评的解剖》(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吴持哲等翻译的威廉·纽的《加拿大文学史》,填补了我国对国外加拿大文学史专论译介的空白。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继续撰写有关加拿大英语文学的综论性文章,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谈加拿大独立前的民族文学》(《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5期)、《论加拿大文学的发展》(《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5期)、《加拿大独立后的民族文学》(《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5期)、《略论加拿大英语小说的演进》(《外语与外语教学》1992年第2期)、《漫谈加拿大早期英语文学》(《国外文学》1993年第1期)。这些文章进一步廓清了加拿大英语文学的特征和发展脉络,为文学作品的译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源。这个阶段还出现了我国学者编撰的加拿大英语文学史,比如黄仲文和张锡麟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郭继德的《加拿大文学简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和《加拿大英语戏剧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这些专论的出现无疑是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译介史上的突破,它们更加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加拿大英语文学的渊源和流变,是综论性文章的扩展。另外,我国学者撰写的外国文学史也开始关注加拿大英语文学,张玉书主编的四卷本《20世纪欧美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是一个代表。

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译介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表现出

新的特点:

第一,作品译介题材的多元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文化格局多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另外,像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量译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社会的诗学形态,改变了赞助人和译者在内的受众对于译介题材的选择标准。在所有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我国90年代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的译介题材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化。

第二,译介体系进一步完善。20世纪80年代确立的加拿大英语文学译介体系包括文学作品翻译、文学理论翻译与综论性文章三部分。这一体系在90年代由于我国学者所著文学史专论的出现而获得了横向延伸;又因为对每一部分的深入挖掘而实现了纵向拓展。

第三,初步确立跟踪式译介模式。20世纪80年代的加拿大英语文学译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补课”,也就是说,大部分被译介的是原本早就应该被译介,但却因为客观原因没有被译介的作品。进入90年代,加拿大英语文学作品在国外的出版,与在我国的译介正趋于同步,逐渐形成一种跟踪式的译介模式。例如,《别名格蕾丝》、《爱之猎物》、《漂泊手记》和《英国人的仆童》都是1996年在国外出版,而在1998年我国就有了中文版。

#### 四、学术与社会热点观照下的译介新局面

进入21世纪以来,加拿大英语文学译介在继续挖掘名家名作的同时,时刻关注加拿大当代英语文学的新人新作。阿特伍德虽贵为“加拿大文学女皇”,却总与国际文学大奖无缘。2000年,凭借长篇小说《盲刺客》,阿特伍德终于斩获有“小诺贝尔文学奖”之称的英国布克奖。应该说,这个奖项有力地推



动了阿特伍德在中国的译介。2000年至2009年,我国翻译出版了阿特伍德所有13部长篇小说中的8部,加上之前已经出版的3部,阿特伍德的长篇小说基本都有了中文译本。<sup>①</sup>就长篇小说而言,阿特伍德在国内的译介是相当充分的。另外一位受此待遇的作家是翁达杰。《英国病人》让翁达杰早在1992年就摘得布克奖,成为加拿大首位获此殊荣的作家。翁达杰的小说作品并不多,但每部都是精品。除《英国病人》外,《经历斯洛特》(译林出版社2003)、《身着狮皮》(译林出版社2004)和《菩萨凝视的岛屿》(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也都得到译介。截至2009年,翁达杰的长篇小说除了2007年出版的新作《遥望》之外都有了中文版。<sup>②</sup>翁达杰小说的文学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少数族裔背景赋予他的双重写作视角,以及他不断质疑真实与虚构、历史与文本之间界限的后现代创作理念。翁达杰的这一特点也适用于鲁迪·威伯。作为俄裔加拿大作家的杰出代表,威伯的作品同样具有浓厚的后现代色彩。重庆出版社2001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大熊的诱惑》和《发现陌生人》,2004年推出他的另外一部作品《天伦之爱》。得到译介的加拿大后现代英语文学作家作品还有乔治·鲍林的《燃烧的水》(译林出版社2000)和伦纳德·科恩的《大大方方的输家》(译林出版社2003)。哈琴认为前者是加拿大作家通过“解构英国的社会和文学神话,来重新定义自己的殖民地历史”的后现代小说,<sup>[13]16</sup>后者是加拿大文学中后现代元小说的先例。<sup>[13]27</sup>2002年,扬·马特尔荣获布克奖,成为新生代加拿

大作家中的佼佼者。译林出版社2005年出版了他的获奖作品《少年Pi的奇幻漂流》。此后《外国文艺》2006年第6期和《世界文学》2008年第5期又分别译介了马特尔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方面,被译介的作家作品还包括希尔兹与霍华德合著的《分居时期》(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和希尔兹的《偶然事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安·玛丽·麦克唐纳的《跪下你的双膝》(重庆出版社2000)、罗萨琳·麦克菲的《毕加索的女人》(花城出版社2001)、梅丽琳·西蒙德的《囚犯情人》(译林出版社2001)、大卫·理查兹的《孩子间的仁爱》(重庆出版社2004)、米利亚姆·托尤斯的《复杂的善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韦恩·约翰斯顿的《纽约的探险家》和《梦碎之地》(重庆出版社2006)、弗朗西斯·布鲁克的《艾米莉·蒙塔古往事录》(民族出版社2006)、罗·查·威尔森的《时间回旋》(新星出版社2008)、彼得·罗宾森的《约克郡人骨之谜》(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蜜利安·席尔的《葡萄牙修女的情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查·斯·理查森的《字母的尽头》(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短篇小说方面,被译介的作家作品包括阿特伍德的短篇小说集《帐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道德困境》(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和《蓝胡子的蛋》(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范德海格的短篇小说集《走下坡路的男人》(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当代外国文学》2000年第2期和《外国文学》2001年第2期分别译介了芒罗的短篇《爱的进步》和《平坦之路》。《世界文学》2007年第1期、

①阿特伍德还没有被译介的两部长篇小说是《人类之前的生活》(*Life before Man*, 1979)和《洪疫之年》(*The Year of the Flood*, 2009)。《肉体伤害》(*Bodily Harm*, 1981)2010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②即 *Divisadero*, 该书中文版《遥望》于201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2008年第6期和2009年第6期分别译介了芒罗、阿·麦克洛德和威伯的短篇小说。《外国文艺》2009年第4期选译了阿特伍德的短篇小说集《黑暗中的谋杀》,译介了芒罗的短篇《空间》。

诗歌方面,《译林》2001年第3期和2006年第6期分别译介了科恩和洛娜·克罗泽的诗作。民族出版社2002年出版《艾米莉·波琳·约翰逊诗全集:燧石和羽毛》。散文方面,主要出版作品包括《里柯克幽默小品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李柯克谐趣作品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此外,《译林》2002年第1期和《世界文学》2009年第6期分别译介了布洛克和汉·范特尔的作品。戏剧方面,重庆出版社2000年出版麦克唐纳的剧作《晚安,苔丝狄蒙娜:早安,朱丽叶》。

21世纪的加拿大英语文学作品译介在选材方面表现出新的特点。首先,后现代、后殖民风格的作品被广泛译入。其次,儿童文学和动物文学(特别是动物文学)的译介量有大幅提升。译林出版社2001年推出《绿山墙的安妮》的复译版;2005年出版肯尼思·奥培尔的《银翅蝠》、《日翅蝠》、《火翅蝠》;2009年推出“绿山墙安妮系列”,出版《绿山墙的安妮》、《花季的安妮》、《小岛上的安妮》、《风吹白杨的安妮》。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罗伯茨的《野地的亲族》。北京出版社2000年推出“西顿动物文学经典”,出版包括《塔克拉山的熊王》在内的五本西顿动物故事。译林出版社2001年出版《西顿野生动物故事集》;南方出版社2003年出版《西顿动物小说全集》;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西顿的《野性之美》;新星出版社2006年出版三卷本西顿《动物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西顿动物小说》。

文学理论和研究资料的译介方面,《外

国文学动态》2002年第3、4期译介了阿特伍德在2000年加拿大问题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加拿大文学生存谈》。这篇讲稿意味深长,发人深省,对于进一步认清加拿大文学的生存状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弗莱生前的最后一本著作《神力的语言“圣经与文学”研究续编》。《国外文学》2005年第4期译介了加拿大著名文学批评家戴维·司泰因斯的论文《隐身洞穴:加拿大文学的后殖民自恋》。该文运用拉康的心理分析解读了加拿大英语文学中倾向于沉迷历史的后殖民心态,为加拿大英语文学的后殖民解读提供新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帕米拉·麦考勒姆和谢少波选编、蓝仁哲等翻译的《后现代主义质疑历史》。这本论文集收录了包括哈琴在内的当代加拿大12位著名批评家的代表性文章,所论议题涉及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等,是了解当代加拿大文学和文化批评走向的不可多得的材料。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了哈琴的另外一部重要著作《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在本书中,哈琴全面阐述了后现代主义的诗学建构,揭示了后现代主义的深刻性、复杂性和矛盾性,提出了如“历史元小说”这样的著名概念,是后现代主义诗学思想的奠基之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耿力平等翻译的威·约·基思的《加拿大英语文学史》(修订扩充版),填补了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史专论译介的空白。

新世纪里,我国学者撰写的关于加拿大英语文学的综论性文章更加具体,视野更加开阔。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加拿大华裔英语文学的兴起》(《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3期)、《加拿大华裔英语文学述评》(《当代外国文学》2003年第3期)、《后现代、后殖

民视野中的加拿大英语文学》(《世界文学》2003年第4期)、《从殖民地到全球化: 面对超级强邻美国的加拿大文学》(《世界文学》2004年第6期)等等。这些文章既关注加拿大英语文学的最新动态,又从深层上解析加拿大英语文学的生存状态,构成对加拿大英语文学的立体化呈现。文学史专论方面,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朱徽撰写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简史》。该书材料翔实,全面反映了加拿大英语文学的成就和最新进展,是对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简史》和《加拿大文学简史》的重要补充。此外,我国学者撰写的外国文学史继续介绍加拿大英语文学,比如李明滨主编的《20世纪欧美文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和吴元迈等编著的五卷本《20世纪外国文学史》(译林出版社,2004)。

21世纪的头十年是我国加拿大英语文学译介向纵深发展的阶段,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和反思的现象:

第一 在作品译介的选材方面(特别是长篇小说),少数族裔和具有移民背景的作家创作的后现代和后殖民小说成为译介的重点,像翁达杰、威伯和鲍林等作家。这一方面说明“‘后现代’、‘后殖民’和‘多元文化’成了加拿大英语文学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中密不可分的特点”,<sup>[14]</sup>另一方面也契合了我国当下的整体文学理论范式和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学术热点问题。

第二 具有跨界职业背景的作家成为译介对象。《跪下你的双膝》的作者麦克唐纳和《葡萄牙修女的情书》的作者席尔不仅是作家,还是颇有名气的演员,理查森在推出处女作《字母的尽头》时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图书设计师。作家多元的职业背景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了译介选材的多元化,同时彰显了消

费文化背景下我国外国文学译介选材中的通俗意识。具有多元职业背景的作家也许没有专业作家那样的文采和深度,但他们或许更懂市场和读者的心思。他们的作品得以译入,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文化心理作用使然,因为“这个时代的读者似乎比较喜欢文化快餐,追求的是一种文化层面的消费”。<sup>[15]</sup>

第三 动物文学成为译介热点。加拿大拥有深厚的动物文学创作传统,涌现出以罗伯茨、西顿和莫厄特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的动物文学作家。西顿的作品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被译入我国,之后罗伯茨和莫厄特的作品也相继得以译入。而如前文所述,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更是出现了一段加拿大动物文学的译介高潮。何以会出现这种现象?结合我国当前的社会文化语境分析,就不难发现个中原因。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大幅提升,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但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了资源浪费、生态失衡等负面影响,所以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建和谐社会就成为我国当下的重要舆论导向和研究课题。加拿大动物文学作品表面上写动物,实则“通过描写动物的生活来表达对人类的关心,倡导平等地对待所有的生命成员,强调整体,关注未来,追求和谐”。<sup>[16]</sup>因此,除了本身具有的规模和成熟度,加拿大动物文学的精神内核与我国当下社会文化语境相契合也是它得以大规模译入的重要因素。

## 五、结 语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我国的加拿大英语文学译介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版图还在不断扩大。上述介绍与分析表明,文学翻译是多元文化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发生方式、产生的影

响在很大程度上受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的制约。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心理、社会文学范式、读者的审美习惯等超文本因素都会对文学翻译提出不同的要求,从而形成形态、功能各异的翻译文学。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文学翻译与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度的,通过文学翻译活动产生的翻译文学会对文学系统构成要素之一的本土文学产生反作用力,影响甚至改变本土文学的语言风格和创作范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翻译文学对中国传统小说创作的冲击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作为国别(民族)文学的一部分,译作对丰富和发展国别(民族)文学作用巨大。<sup>[17]</sup>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的历史时期,加拿大英语文学的译介将会对我国当代的本土文学创作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孟昭毅,李载道. 中国翻译文学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90.
- [2] 许钧. 翻译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204.
- [3] 姜秋霞. 文学翻译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 [4] 陈玉刚. 中国翻译文学史稿[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89:401.
- [5] 斯蒂芬·里柯克. 里柯克小品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141.
- [6] 孙致礼. 中国的英美文学翻译:1949—2008[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197.
- [7] 申慧辉. 寻回被盗走的声音——当代加拿大英语文学中的后殖民意识[J]. 世界文学,1994(5):196-209.
- [8] 诺思洛普·弗莱. 诺思洛普·弗莱文论选集[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47.
- [9] 玛·阿特伍德. 加拿大文学生存谈(上)[J]. 外国文学动态,2002(3):4-6.
- [10] 斯蒂芬·里柯克. 里柯克幽默小品[M].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0:1.
- [11] 陈厚诚,王宁. 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163.
- [12] 蓝仁哲. 加拿大文学在中国的接受[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6):17-21.
- [13] Linda Hutcheon. The Canadian Postmodern: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Canadian Fiction[M]. Toronto,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14] 傅俊. 傅俊文学选论[C].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 [15] 朱振武. 中国翻译文学:从经世致用到文化消费[N]. 人民日报·副刊,2010-3-23(20).
- [16] 刘捷. 加拿大动物文学的流变[J]. 外国文学,2005(2):79-85.
- [17] 谢天振. 译介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220.

## The Translation of Canad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in China (1949—2009)

### —And Socio - Cultural Aspect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ZHU Zhen-wu<sup>1</sup>, QI Liang<sup>2</sup>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2.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Being an integral part of Chinese scholarship on Canad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the translation of Canad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was scarce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got under way in 1980s, grew in full swing in 1990s and thrived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translation of Canad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in China exhibits the socio-cultural aspect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Extra-textual factors like socio-cultural psychology, literary paradigm and readers' aesthetic orientation at different times have different requirements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 thus resulting in translation literature with a variety of patterns and functions.

**Key words:** Canad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literary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literature

(责任编辑:魏琼)